

■ 学科史与学科基本理论

DOI:10. 15998/j. cnki. issn1673-8012. 2025. 05. 008

中国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建设：
新生代学者的缺位与诉求



刘 进^{1,2},王思宇¹,于宜田¹,高 媛²

(1. 北京理工大学 教育学院, 北京 100081; 2. 南方科技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深圳 518055)

摘 要:高等教育学作为中国最年轻的人文社会科学之一,尚未建成知识边界完整和学科地位独立的基本理论体系。新生代学者是否缺位其中,他们对此又有何诉求? 分析新老两代高等教育学人研究主题的各自特征与演化规律发现,老一辈学者对大学之道的求索在新生代学者中日渐式微。对新生代学者进行访谈并结合其对学科建设研究成果的公开观点,发现他们在主观上有疏远基本理论研究的倾向。这种缺位源自对该领域传统研究范式持不同意见和对研究文化的不满,对学科基本理论建设行为本身的价值怀疑,主观上源于其普遍处于学术生涯早期面临的能力恐慌与生存压力。尽管暂时缺位其中,新生代学者对学科基本理论建设仍有切实诉求,他们从自身研究所长出发,希望能将具体问题研究广泛融入基本理论建设,在多学科交叉融合中拓展基本理论研究边界,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推动基本理论研究向实证和科学方向转型。新老两代学人对学科基本理论建设总体方向的认识一脉相承,两代学人的研究主题和范式差异也应视为学科成熟的自然渐进过程。

关键词: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学科建设;新生代学者;学术代际

[中图分类号]G6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25)05009612

修回日期:20250519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帽子’政策促进还是抑制了学术人才回流——基于对 580 万份简历大数据库的人工智能(准)因果推断”(7237402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政府奖学金能否提升来华留学生质量——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一带一路’国家因果推断”(71974012)

作者简介:刘进,男,江苏东海人,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访问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国际化和教育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研究;

于宜田,女,河北邢台人,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

高媛,女,天津人,南方科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助理教授,博士,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国际化、跨文化教育和高等教育理论研究。

通信作者:王思宇,男,山西忻州人,北京理工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和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引用格式:刘进,王思宇,于宜田,等. 中国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建设:新生代学者的缺位与诉求[J]. 重庆高教研究,2025,13(5): 96-107.

Citation format: LIU Jin, WANG Siyu, YU Yitian, et al.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theories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the absence and appeals of new-generation scholars[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5, 13(5): 96107.

高等教育学是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体系中最年轻的学科之一。自创立以来,几代学者不懈努力,旨在构建独立的基本理论,强化学科标识、构筑学科边界、指导学科研究与实践。历经几代学人努力,中国高等教育学边界完整和地位独立的基本理论体系仍未建成,与此同时,大量西方理论、外学科理论不断抢占高等教育学话语高地。更大的危机在于,高等教育研究中的新生代学者开始出现不重视、不关心、不参与基本理论建设的趋势,理论断档、人才断层、学科建设断线等风险增加。普遍受过较严格学术训练和较长周期学科规训的新生代学者,为何反而缺乏学科归属乃至学科自觉,降低参与基本理论建设与实践意愿?高等教育学基本理论长期建而不成,是否导致新生代学者丧失信心,甚至放弃基本理论建设努力?新生代学者是否正凭借获取新理论、学习新方法等优势,大量引入其他国家和其他学科的话语体系,弱化高等教育学的独立学科地位?抑或新生代学者对早期基本理论建设目标、路径、手段等并不认同,正尝试通过新的理念、方法、技术等寻求突破?目前学术界对上述问题并未给予充分关注。历史终将把高等教育研究重任传递至年青一代,学术界应重视新生代学者的学术理想与诉求,给予其参与学科基本理论建设的话语权限和发声机会,鼓励、支持其在基本理论研究的范式和方法中寻求创新突破。新生代学者对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建设的立场,关乎基本理论乃至学科体系建设的未来走向。本文尝试从代际比较切入,首先采用文本分析法,梳理新生代学者与老一辈学者研究主题的各自特征及二者间的演化规律,以考察新生代学者是否缺位基本理论研究,进而通过深度访谈和对各代学者公开的研究观点进行梳理,总结新生代学者对学科基本理论建设所持的基本态度及其冷落和疏远基本理论研究的成因,进而凝练并转述其对学科基本理论研究的意见和诉求。

一、新生代学者在基本理论研究中是否缺位

为考察新生代学者的研究特征,首先对高等教育学人进行学术断代划分。学界一般采取学术谱系或生理年龄的划分方法。前者以师承关系为中心划分学者代际,以高等教育学创始人潘懋元的学术谱系为例,其已传至第四、第五代学者。如果再加入生理年龄维度,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青)规定,45岁及以下均可视为新生代(青年)学者。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国情社情的一个分水岭,各行业都有视“80后”“90后”为行业生力军的习惯。故本文将学术谱系分为第一、第二、第三代,即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学者划作老一辈学者或奠基性学者,在文献统计中以“60后”和“70后”学者为主;将学术谱系为第四、第五甚至更新一代,即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的学者划为新生代学者,统计中以“80后”学者为主。

(一)奠基性学者对“大学之道”求索开拓

通过对两代学者公开发表论文的文献计量和人工梳理,分析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主题的代际特征与变化规律。为使抽样更具代表性,我们从两代学人中各自遴选一批具有“显示度”的学者。在奠基性学者中,除少数几位公认的学科创始人外,我们还检索了高等教育领域的几本权威期刊,选出其中发文量和引用量最大的一批作者(部分),并通过其公布的简历信息确定作者年龄和学术代际。遴选入围的学者大多曾任或现任各院校高等教育学科负责人或带头人,我们最终选定30余位奠基性学者作为分析样本。采用同样的方法对新生代高等教育学人进行抽样,选取近十年在某教育权威期刊上发表过文章并获得较高下载和引用量,且通过公开简历确定为1980年后出生的20余位新生代学者。最后,从中国知网检索这50余位学者公开发表的论文,分别得到5000篇(奠基性学者)和1500篇(新生代学者)论文成果,进而导出每篇论文的题目和关键词,并采用软件工具(Payton)进行词频统计^①。为削弱文献计量产生的数据噪声(如与主题无关的非学术性词汇反复出现),从大量主

^① 为避免一些作者发文数量过多而干扰对主题的“平均”聚类,统计分两步进行:(1)从每位学者的全部论文题目和关键词中得出其高频词N个,总计(30+)×N个高频词;(2)从全部学者的高频词(30+)×N中选出共性高频词,得到所有学者共同关注的研究主题。

题中识别特征与规律,我们在文献计量的基础上,人工查阅了两代学者各自影响力最大(被引量最高)的一批文献,从而得到共性最高的一些研究主题。

词频统计显示,高等教育学奠基性学者的研究主题贯穿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整个进程,从高等教育定位与分类(如民办院校、单科性院校、综合性大学、高等职业院校),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再到高等教育质量建设(本科教学评估、大学招生改革),总体呈现高等教育事业从外延式发展向内涵式发展转型的趋势。高等教育市场化、产业化、高等教育满足社会需求与提供社会服务、产学研合作、高等教育国际化等主题,反映了市场化改革与对外开放形势下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复杂的外部环境。在内部结构方面,大学组织与制度建设是奠基性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出现最多的主题词包括现代大学制度、大学章程、学科建设、学术共同体、高等教育治理等。组织与制度建设围绕新旧体制的转型展开,既包括高校教师聘任制改革、大学去行政化、学术评价体系改革、绩效评估等,也包括以高考改革为中心的大学招生制度改革。体制问题进一步指涉大学各方利益主体,如大学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大学内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冲突、高等教育机会公平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又自然延伸到对大学本质异化的讨论,诸如学术资本主义^[1]、后现代主义^[2]等议题开始出现,最后上升到对大学精神与文化的反思。大学自治、教授治学、学术自由、大学的适应性与超越性等,成为那个时代最具引领性的教育思潮。高等教育中的师生问题也受到普遍关注,以学生为中心^[3]作为现代教育学的主流思潮进入高等教育领域,一些学者号召发起“课堂革命”^[4],加强大学课程建设、平衡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的关系,给学生以“学习自由”,同时增强大学德育和思想教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保障大学生就业等。就教师而言,如何平衡教学与科研的关系、促进自身职业生涯发展、应对新型职业压力等成为普遍议题。正如阎光才指出,“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建构,带有现实需求驱动的特征,纳入学科的社会建制是促成其生成与快速发展的动因”^[5]。

梳理发现,奠基性学者的宏观研究主题带有基本理论研究的鲜明特征。这些研究主题可进一步归纳为对大学之道的求索,即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中具有基本性和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主要涉及以下 4 个方面。(1)涉及高等教育上层建筑、外部环境和发展资源的问题。这些问题事关高等教育的规模、结构、发展走向、办学模式和社会定位等。适逢改革开放之初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全面恢复、大规模建设与大刀阔斧改革的历史大潮,奠基性学者紧锣密鼓地讨论高等教育办学宗旨、大学制度建设、大学分类发展以及如何处理大学同市场和政府的关系等。在大学扩招(世纪之交)的 10 年间,高等教育质量建设成为发展重点,大学招生改革、本科教学评估、教师聘任制与学术评价体系改革等议题也被提上议程。(2)敢为人先引领高等教育思想解放的问题。大学作为高深学问和先进思想的高地,改革开放之初就积极引入西方教育思想、学习西方先进教育经验。约翰·布鲁贝克、柏顿·克拉克、马丁·特罗等国际高等教育大师的思想被奠基性学者纷纷搬进教材、搬上课堂。高深知识如何生产、认识论与政治论高等教育哲学有何冲突、唯理论和经验论哪个才是求真之路、如何在大学孕育不同的学科文化、大学理性与学术自由的限度何在等议题被师生学者广泛讨论。美、德、法、英和日本等先发高等教育强国的办学经验被系统引进,尤其是研究型大学、学术评价体系、博士教育制度等成为我国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直接参照。(3)关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主要矛盾和迫切危机的问题。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高等教育领域一些深层次矛盾不断暴露并被提上日程,如大学自主招生改革暴露出隐蔽的教育公平问题、大学教师评聘绩效化改革引发“五唯”弊病等。效率与公平如何兼顾?怎样在指标崇拜中保持学术定力、尊重科研规律?如何在强化学科内部建设的同时避免过度“近亲繁殖”?这一系列高利害问题触及高等教育事业的健康和生命,奠基性学者在这些问题上的深入探讨,有力推动了整个社会主动应对问题并化解危机。(4)触及高等教育本质属性

和根本规律的问题。对上述 3 类问题的思考势必触及更为根本的高等教育元理论、元问题,包括大学本质、大学属性、大学功能与价值、大学内外部关系、大学组织和运行的基本规律等。例如,朱九思提出“大学之本在教师、大学之路在综合、大学之源在科研、大学之魂在学术自由”^[6]。这些元问题也引发对大学历史和大学传统的追溯与沉思,从孔子到柏拉图、从古代书院到中世纪大学、从柏林洪堡改革到近代大学迁徙,东西方经典大学思想被陆续引介和发掘,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的基本格局。

(二)新生代学者研究主题分化与宏观探索式微

上述大问题、大主题属于典型的基本理论范畴,展现了奠基性学者高度的理论自觉和学科归属。正如潘懋元所提出,教育理论有 3 个源泉,分别是过去的实践、国外的实践和现实的实践^[7]。在对大学之道的上下求索中,高等教育学奠基性学者引介了大量西方前沿思想和他国成功经验,不断发掘和整理传统文化中的高等教育思想瑰宝,发现、阐释、批判高等教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融合创造一套适用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基本概念、命题、范畴和原理,开拓了一众高等教育基本分支学科,为改革开放 40 余年来国家高等教育大政方针制定和制度体系改革提供了思想理论指南,也为后来人接续创新学科基本理论开垦出一片沃土。

同样的分析路径显示,新生代学者对高等教育研究中涉及大学本质、顶层治理和宏观发展等问题的学术兴趣普遍下降,其研究主题高度分化,研究问题域明显缩小。对比从奠基性学者到新生代学者的研究主题(高频词)变化,并查阅新生代学者近十年发表在高等教育中文权威期刊上的高影响力论文发现,新生代学者对高等教育的层次类型和定义属性等基本问题、大学(本质)、大学治理、院校研究、高等教育多元发展(职业大学、创业型大学、研究型大学等)、高等教育质量、现代大学制度、(宏观)人才培养一类主题的研究兴趣明显下降。新生代学者研究主题正日益细化和分散,很难归纳比较集中的研究领域。潘懋元提出应在问题研究中开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路^[8],这种理念已被新一代学人继承。新生代学者的研究主题从传统领域继续向前延伸,如伴随高等教育国际化的不断加深,来华留学生质量监测、海外引才机制等问题不断涌现,教师聘任制与学术评价体系改革引发对大学教师“非升即走”和“不发表则出局”的热议等。还有许多老一代学人未注意到的微观领域,如新一代学生的思想情感变化、不同成长背景学生在大学的适应与遭遇、大众化高等教育下教育收益变化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家庭首代大学生^[9]、底层文化资本^[10]等概念陆续舶来,精英大学农村籍学生等有价值的本土问题开始受到关注。

与奠基性学者研究主题的宏观性和外部性相比,新生代学者在研究风格上表现出更强的现实性和反身性。例如,市场化改革 30 年后阶层流动放缓,导致高等教育回报率下降,“寒门贵子”“读书无用”等议题回潮^[11],进而演化为“小镇做题家”这类社会痛点^[12],高等教育向上流动问题受到持续关注。农村籍大学生、留守经历大学生、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在大学的成才遭遇和处境,更是城市化进程中大学教育必须面对的问题。大学持续扩张与经济增长放缓带来学历饱和与贬值,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严峻。此外,经济高速增长与产业不断升级,教育改革相对滞后,导致劳动力市场人才供需失衡,劳动者个体学历失配与学用失配也日益普遍,高等教育对居民收入、经济增长和区域发展的贡献得到越来越多的实证检验。与此同时,上述研究主题的学科外溢效应日益明显。“小镇做题家”和“寒门贵子”等典型的高等教育话题被社会学占领,有关高等教育投资与收益的重大成果一半以上由经济学和管理学者贡献,在高等教育最核心的自留地——人才培养与学生发展领域,一些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也大多来自心理学和管理学等硬社会科学。

对近二十年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论文的补充性分析发现,新生代学者系统性研究中的理论意识

也在消退。为进一步验证这一发现,我们查阅了国内两所著名院校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博士学位论文底稿各 383 篇和 396 篇,其中有效样本共计 282 篇。运用 NVivo 软件对教育博士论文摘要进行词频统计,剔除缺乏实际含义的词汇后,共筛选出 20 个高频词汇。其中,“理论”出现的频次仅排名第 16 位。进一步查阅博士论文发现,新生代学者系统性研究的理论基础部分以外国和外学科理论借鉴为主,在理论目标中也鲜有提及原始创新和本土化贡献。大多数博士论文遵循“理论框架+研究问题”的研究范式,运用宏观理论解释教育现象、运用中观理论开展研究设计、基于微观理论形成研究假设或问卷访谈,研究结论往往对理论本身的创新贡献不足,大多数是印证理论发现、检验理论假设、进行理论修饰完善,缺乏对理论本身的创新贡献,尤其是缺乏对旧理论的革新、新理论的提出以及理论的本土化贡献。

二、新生代学者为何缺位基本理论建设

文献研究发现,新生代学者相比奠基性学者,其研究主题显著分化,探讨宏观议题的热情式微,在系统性研究中也有理论意识消退的痕迹,表明其有缺位学科基本理论建设的趋势。这一发现是否属实?其背后成因为何?为此,北京理工大学与南方科技大学联合课题组进行了系列访谈。课题组共完成 21 位新生代学者访谈(应访谈对象要求采取匿名处理)。本文在撰写时还参考了 12 位新生代学者在“教育治理与国家高质量教育发展”国际高峰论坛上有关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发言素材,以及 15 位新生代学者在《重庆高教研究》第一届青年学术委员会上的发言素材。访谈内容主要包含 5 个方面,即高等教育理念、高等教育职能、高等教育理论与实践创新、高等教育学科建设方面的评价意见和建议。访谈工作从 2021 年底开始(目前仍未完成),本文主要报告目前已经开展的对新生代学者的访谈成果。在此过程中,为方便对新老两代学者的学术观点进行比较,本文还采用文献研究方法,选取部分奠基性学者有关学科基本理论建设的文献观点。在总结受访者观点的过程中,本文同时使用文献方法对核心访谈结果进行质性分析。访谈发现,新生代学者对学科基本理论建设现状的总体评价偏低,其自身参与基本理论研究的热情也普遍不高。当新生代学者被问及“您认为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学界是否形成基本理论体系或正在建设基本理论”时,只有少数新生代学者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基本理论仍然在建设之中,部分理论创新具有本土特色^①。绝大多数新生代学者认为,当前中国并未真正建成所谓的高等教育基本理论体系,不但如此,青年学术界总体上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热情正在迅速消减,新生代学者不重视、不关心、不参与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现象较为普遍。

(一)新生代学者对基本理论研究传统范式持不同意见

在部分新生代学者看来,基本理论研究的传统范式存在以下局限。(1)研究内容大而不当,许多研究停留在现象阐释和概念提出层面,缺乏规律探究^[13]。长期关注组织和制度建设,对真正作为高等教育主体的师生发展关注不足,不能及时捕捉微观教育场域不断涌现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自上而下”施以实践创新,形式主义严重,压制新生代学者创造力,难以涌现真正的“创新”。(2)研究方法取向单一,许多都停留在低水平模仿和空洞的政策阐释。文献计量也表明,“宏观思考”“理论启示”等是传统研究方法出现频次最高的词语。(3)研究结果脱离实践,难以真正指导师生发展、教学改革和满足国家战略需求。部分新生代学者认为,当前大部分研究借用西方理论对我国高等教育实践进

① 访谈中谈及的本土理论包括潘懋元的内外关系规律理论、闵维方的规模效益规律理论,以及现代大学制度与大学治理相关理论、政策驱动改革相关理论、高等教育质量与公平相关理论、高等教育社会分层与流动相关理论、科教融合与产教融合相关理论等,访谈对象认为这些理论“外国学界没有或者不完整”“中小学教育研究领域没有”,因此可视为本土理论。

行再检验与修正,其经验证据缺乏批判性反思,很多西方理论无法直接用于我国高等教育理论建设与实践应用,导致理论闭环出现断裂。访谈中,新生代学者普遍认为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已经严重滞后于教育实践,非但不能引领学科发展,反而制约了学科基本理论建设以及具体的研究与实践活动。(4)研究领域边界不明。有学者认为,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局限于教育科学领域,导致高等教育学与一般教育学界限不明、概念不清,带来高等教育学的课程体系早熟和对普通教育学理论的依赖性,也忽视其他学科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积极影响^[14]。

结合国内外社会科学研究变革趋势,我国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传统范式被动落后的风险愈加显现。国际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已基本完成实证化改造。规范化、循证化、大数据计算、从变量相关到因果推断的研究范式,已主导国际社会科学研究。传统的理论思辨、个案剖析和文献梳理方法相形见绌,其可信度、可重复性和推论性都难以与现代研究匹敌^[15-16]。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相对更“硬”的社会科学,也从理论和方法再到范式,不断对高等教育乃至整个教育学界形成冲击,学科交叉与融合势在必行。

(二)新生代学者对基本理论研究文化满意度不高

部分新生代学者对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文化氛围满意度不高。(1)过度追踪热点。虽然高等教育研究者在做好基础研究的同时,应对热点问题予以关注并做出积极回应,但不加辨别地研究各类热点问题,尤其是一些学者热衷追踪政策和时事热点,反而会使高等教育理论研究泛化和高等教育理论界限模糊。(2)功利主义盛行。当前高等教育学界浮躁、功利的学术价值取向,重成果发表轻学术理想,无益于教育问题的解决与高等教育学科基本理论的建设。(3)学科包容度不足。一些新生代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学基本理论建设应更多依托于分支学科中的概念迁移和方法论借鉴,分支学科交叉应成为高等教育学科理论创新的源泉,但当前高等教育学各分支学科研究受到冷落,导致高等教育学基本理论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与此类观点相反,也有一些新生代学者认为当前高等教育学交叉学科过于“蓬勃”,在为高等教育学做出重大学术贡献的同时,也导致高等教育学面临学科整合、范畴不清的困境,以及对高等教育学科立场、研究范式的质疑。高等教育学理论与方法论基础亟待理顺,高等教育学专业边界有待重构。(4)学术共同体同其他学科一样存在内卷倾轧现象。新生代学者碍于学缘、辈分、人情和权威等,惮于批判前人,健康活跃的批判性学科文化在高等教育学界尚未形成。(5)部分年轻学者盲目跟风。老一辈学者对高等教育问题的高屋建瓴以其深厚学养和丰富履历为背景,许多更是因应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咨政所需,故早期的基本理论成果大多是真知灼见并能久经检验。对刚走上高等教育学术道路的年轻学者尤其是研究生来讲,在缺乏学养积淀和实践历练,又难以把握大政方针和宏观走向的情形下贸然模仿,则有陷入高谈阔论、自说自话的语言文字游戏和背离科学研究本真的风险。

(三)新生代学者对进行基本理论研究的学科行为本身存疑

访谈中新生代学者很少再谈及元教育学、元高等教育学等问题,虽然普遍同意应从研究成果中进行理论沉淀与理论建构,但普遍反对直接面向基本理论研究为理论而理论。一些受访者认为,长期以来高等教育学基本理论建而不成,可能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高等教育学基本理论”,高等教育学本质上就是人为创造的新学科,更多属于具体的研究领域而非学科,高等教育学基本理论不存在单独建设的必要,其理论溯源要么归类为其他学科(或分支学科)的基本理论,要么归类为教育学的基本理论,单独建设高等教育学基本理论无异于缘木求鱼,难有结果。结合文献分析,还有一个可能的重要原因,早期高等教育研究队伍精英化,专门的学科研究集中在几所精英大学的高教所和教研

院。适逢高等教育事业全面恢复与改革的召唤,奠基性学者表现出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和紧迫感。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高等教育学科的培养规模和学术队伍规模也不断扩张,研究领域不断向外扩散,这些都使得新生代学者更倾向“螺丝钉”的研究定位,专注自身狭小领域的具体问题,逐渐弱化对基本理论研究的学术责任感与使命感。

(四)新生代学者的能力恐慌与学术生存压力

访谈发现,新生代学者对基本理论研究普遍存在畏难情绪和能力恐慌,且面临较大的学术生存压力。一些青年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固然重要,但真正建成完善的基本理论体系需要长期积累。高等教育学与其他一些新兴学科一样,其基本理论体系的探索、成型、完善、验证、修正等,需要很长的历史周期和持续的知识沉淀,需要几代、十几代甚至更多代际的学者参与。与之类似,另一些青年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复杂学科,基本理论研究难度很大,应更多由成熟学者、知名学者、领军学者参与,青年学者应聚焦特定、窄化研究议题展开纵深研究。也有青年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普遍需要年龄、知识、实践、经验等方面的积淀,青年学者学术价值观尚未成型,学科判断力和全局掌控力有限,尚不具备开展学科基本理论研究的能力,不应轻易涉足。此外,新生代学者普遍反映其在学术生涯早期面临“非升即走”和“不发表则出局”的学术考核压力,难以投入周期长、见效慢、研究失败率高和成果难以发表的宏观问题研究和系统性研究项目。

三、新生代学者对基本理论建设有何诉求

新生代学者虽然对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建设现状进行批判,也缺乏参与热情,但也表达了愿意投身基本理论建设的责任与使命,对学科基本理论建设的方向和前景也提出一些建议。

(一)将自身的具体问题研究融入学科基本理论研究

坚持问题导向是几代学人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共同认识。奠基性学者最早指明高等教育学人可在问题研究中实现理论与实践的辩证统一。潘懋元曾提出教育理论源自过去的实践、国外的实践和现实的需要,只有从实践中获得并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才能发展成熟^[7],高等教育研究要将“求真”与“求用”结合起来,在问题研究中开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新路^[8]。朱九思在此方面的观点类似,也呼吁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与实际工作者密切合作,把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真正结合起来变成一张皮^[6]。第二代学者进一步阐发以问题导向研究的价值。他们认为,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其研究领域具有突出的应用取向,既需要高等教育学科通过理论研究解决实践问题,也需要通过实践推动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17-18]。我国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者应放下身段、重视实践、扎根实践,从实践出发,聚焦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领域最普遍、最紧迫的难题,总结、凝练高等教育理论,使我国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立足实践并服务实践^[19]。新生代学者一脉相承,创造性地提出将自己的具体问题研究融入学科基本理论研究。他们普遍认为,高等教育研究应重视具体问题对理论研究的重要作用,通过学术共同体开展整合性研究,从具体问题研究中总结规律、原则与方法,形成高等教育学自身的学科基本理论框架,充分发展高等教育学的基础理论知识、核心理论知识,构建具有内在逻辑与自身话语权的高等教育基本理论^[20]。真正好的高等教育研究应该是“具体问题引领”而不是“无病呻吟”。部分第三代学者认为,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应实现跨学科、跨代际合作,将不同学科、领域和代际的优秀人才团结在解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具体问题研究的队伍中。

此外,新生代学者也意识到当下高等教育研究中具体问题研究与基本理论研究的失衡问题。他们普遍承认,从具体问题研究中获得的结论具有时效性,大多难以进行广泛推论,无法指导更一般的

[illegible]

视角新颖、切口细微的选题在高等教育权威期刊上不断涌现,但经过仔细考察和审慎辨别后发现,不少文章只描述了局部或偶然现象,并不具有普遍性。一些研究明显带有学者的自身经历和主观特征,过度表达个人兴趣,难以产生较大的推广价值,能否经得起更大范围和更长时间的检验也未知。例如,愈来愈多新生代学者开始关注青年教师的职业境遇,“非升即走”“预聘制”“破五唯”、学术劳动力市场变革、学术职业回报、学术人才流动等事关个人利害的问题研究成为主导许多新生代研究者的主攻领地。更广泛和更有价值的研究主题遇冷,部分新生代学者在研究选题上出现学术兴趣个人化和私人化倾向,长此以往有窄化学科功能和滥用学术工具的风险。在研究方法上,局限于微小的具体问题也更易转向方法导向、数据导向、模型导向,擅长哪种方法就做哪类研究,掌握哪些数据就研究哪些问题,是否与高等教育相关,产出结果能否形成知识贡献和社会效益等,均不在优先考虑之列。照此趋势,高等教育研究内容的分化与分散将日益加剧,围绕学科目标的知识体系建设将愈加困难,不利于建立专业标识和学科边界。

(二)在多学科交叉融合中拓展学科基本理论的研究边界

新老两代学者一致认同多学科研究方法。潘懋元从教育的内外部关系规律出发,在国内最早明确提出高等教育学的多学科研究方法。从本质来看,高等教育学是一门具有复杂性和多层次的应用性学科,多学科交叉融合是其显著优势与内在需求^[25]。第二代、第三代学者进一步认识到学科交叉融合对高等教育学发展的重大价值,认为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和面临的问题日益复杂化、综合化,采用多学科交叉融合方法不仅能帮助科学分析、有效解决高等教育研究问题,还能推动高等教育知识更新与理论创新^[23]。高等教育理论的形成需要用多学科研究方法研究高等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问题^[26],一些新生代学者甚至放弃了从本学科进行原始理论创新的思路,更多考虑从多学科视角进行理论创新。但也有一些新生代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研究好不好,要看其他学科用不用我们的理论,知不知道我们教育学的研究者”,显示出较强的学科自觉。

文献研究印证了访谈的发现,新生代学者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正不断开拓高等教育基本理论边界,如经济学领域的CES生产函数、结构方程模型、PSM倾向得分值匹配、中介效应模型等,被广泛用于大学学术产出、大学经济贡献和高等教育政策效度等方面的研究。其他学科和其他领域的资料(如劳动力信息数据、企业生产数据、就业招聘数据)也被用于高等教育基本问题的研究,越来越多其他学科新生代学者(尤以管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为多)加入高等教育研究队伍。这些趋势使得曾经争论不休的学科属性与特征开始自然呈现,高等教育社会学、高等教育经济与管理、计算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组织行为学等子学科和领域“自下而上”“由外向内”地建立起来,不断充实着高等教育基本理论内涵,几代学人期望的高等教育学科边界也有成型之势。

(三) 采用新技术新方法推动学科基本理论研究的实证化转型发展

多学科与跨学科研究促使新技术、新方法不断涌入。访谈中绝大多数新生代学者认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应引入科学方法,突出实证主义。一些学者认为,近年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非师范类大学在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上主要采用跨学科和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传统师范类大学则

以思辨研究方式为主。尽管近年来教育研究领域掀起了实证研究的热潮,但高等教育研究者大多缺乏向实证研究转型的动力。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学科边界被不断打破,高等教育学的多学科交叉融合属性更加凸显,需要高等教育研究者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工具,开展证据本位的研究,直观呈现研究问题的状态与变化趋势,合理推断研究现象与本质,提高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科学性、规范性与时效性,增强研究结果的解释性、可重复性与说服力^[16]。

对新生代学者研究文献的梳理也印证了上述观点。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掀起的方法革命势不可挡,新生代高等教育学者亦不甘人后,通过成百上千万条大数据、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等方式对数据规律精准发掘、运用机器学习建构复杂模型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开始出现,传统方法受到极大冲击。在具体研究范式上,从模糊主题探讨转向不同变量间的相关性分析,再到运用规范的(准)实验设计、成熟的计量模型进行(准)因果识别。从研究背景和文献回顾中提出假说,再根据假说设计研究方案,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展开定性分析和形成结论,这样一套规范、系统的社会科学标准范式在高等教育学领域日益成熟。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势将完成实证化科学化改造,从传统人文学科正式加入社会科学大家庭,系统化的学科基本理论体系将日臻完善。

四、两代学人能否殊途同归

新生代学者坚持问题导向,拥抱多学科知识,将高等教育研究带上实证化道路。奠基性学者钟爱大系统、大理论,坚持看根本问题和想问题之根本。两代人治学道路的分化既是学科发展演进的客观规律,亦源自其不同的成长背景和教育经历。我们既不能一味以新技术、新范式裁量前人贡献,也不能苛求未经沧海桑田的新生代学者有经世致用的大情怀。时至今日,高等教育学体系完整和地位独立的学科领地尚未确定,能够直面整个学术界和社会大众的基本知识体系尚未形成,其专业话语权在整个社会科学中也缺乏认同,此为两代人面临的共同挑战。未来新老两代学人能否殊途同归,早日建成中国高等教育完整和独立的学科基本理论体系?

主观上,新老两代学人对学科基本理论研究意义的认识一脉相承。老一辈学者阐发了高等教育研究对象和问题的特殊性、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发展性^[27]以及高等教育研究中理论的独立性^[28],树立了高等教育学人投身学科基本理论研究的自觉。第二代学者敏锐洞见新时代学科基本理论建设的新需要,认为应从克服“唯问题是从”^[29-31]、争取学科独立^[32-33]和引领高等教育实践发展^[34]出发,延续基本理论研究的使命。尽管对学科基本理论建设现状存在不满,第三代学者仍期待学科基本理论体系能够早日建成。他们认为,学科建设需要理论,即高等教育学要想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必须凝练具有内在逻辑和规律的学科理论,加快学科建设进程^[35];实践改革需要理论,尽管当前国内外高等教育学以实践性问题研究为主,但高等教育学理论研究能满足实践性的服务需求,对实践改革发挥指导作用^[36];中国特色凝练与国际对话需要理论,如果一味仰仗西方理论的辐射,盲目追求与认可“西方中心主义”,势必出现主体迷失,导致我国高等教育学的边缘化。我国高等教育学应当发展自己的特色,根据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中特有的问题和规律凝练符合我国高等教育性质的理论。

客观上,代际间知识创造和更新必然经历积少成多、去粗取精和博观约取的过程。从奠基性学者到新生代学者,传统主题在向纵深延展,各类问题研究不断具象化且更具有现实性、更贴近教育生活。例如,奠基性学者关注的高等教育招生改革,延续为“谁被‘强基计划’录取”这样的实证检验^[37];“以学生为中心”已经发展到对“寒门学子”大学适应的关注、对精英大学学生学业失败的精准干预,以及对“小镇做题家”的集体反思;大学的办学质量及其为社会创造的价值也正受到更大范围的实证检

验,如高等教育集聚布局对区域创新的实证研究^[38]、大学与城市的耦合发展^[39]、博士生教育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40]、高等教育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41]、“双培养”路径对我国科技学术产出的影响^[42]等。此外,从奠基性学者到新生代学者,一些研究主题从无到有、由粗而精地凝结为更精确的学术范畴与概念,如绩效大学^[43]、学术锦标赛^[44]、底层文化资本、教育失配^[45]等。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变革时代,新生代学者在事关高等教育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中亦未掉队,两代学人的共同关切日益显露。高等教育与共同富裕、高等教育与高质量发展、高等教育与新质生产力、世界一流大学等研究领域不乏年轻学者的优秀成果发表。在教育思想史和基本理论方面,新生代学者也没有停止探索的脚步,阿特巴赫^[46]、麦克·扬^[47]、赫钦斯^[48]等国际前沿思想家经由年轻学者引介进入学界视野,对大学本质和规律的探讨也更加细致。与此同时,奠基性学者也加入新问题、小问题和微问题的讨论,拥抱新方法,吸收新理念。更重要的是,两代人并不缺少共同关切。从文献梳理中不难发现,分散的研究主题中也存在共性主题的持续关切,教育收益、教育公平、教育与经济增长、教育与阶层流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和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等可以成为高等教育学永恒探讨的主题。两代学者的样本论文中相当大一部分也是由新老两代学者合著完成。这些共性主题折射出两代人共同的学术志向与理念,主题的聚类也必将不断产生关联的知识,为系统的基本理论体系建设打下基础。研究主题的具象化和抽象化(概念化)、范式方法的相互学习与融合,共同关切的不断增多,均表明两代学者的学术传承与创新正在进行。

五、结 语

本文基于对高等教育新老两代学者研究主题的文本分析,结合对新生代学者的访谈和文献研究,主要有三方面发现。第一,新生代学者在高等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中日益缺位,其研究主题高度分化,奠基性学者对大学之道的求索在新生代学者中日渐式微。第二,新生代学者缺位基本理论研究存在一些共性成因,既有对传统研究范式持不同意见,又有对该领域研究文化存在不满的因素,更不乏对基本理论建设这一学科行为本身作价值否定的原因,同时也不可忽视新生代学者面临的早期学术生存压力。第三,新生代学者对基本理论建设满怀诉求,表达出建设学科基本理论的新路径,提出将具体问题研究广泛融汇其中,在多学科交叉融合中拓展理论研究边界,采用新技术和新方法推动基本理论研究向实证和科学方向转型。本研究局限之处在于:(1)访谈对象的样本量不够大,尤其是对于奠基性学者的访谈较少,因此本文并未直接使用奠基性学者的访谈素材,主要使用这些学者公开发表的学术观点;(2)作者本身作为新生代学者,容易将自身观感带入研究写作,难免有失偏颇。

参考文献:

- [1] 王英杰.大学文化传统的失落:学术资本主义与大学行政化的叠加作用[J].比较教育研究,2012,34(1):47.
- [2] 魏小琳.后现代视野中的高校课程体系建设[J].高等教育研究,2007(7):9094.
- [3] 刘献君.论“以学生为中心”[J].高等教育研究,2012,33(8):46.
- [4] 别敦荣.大学课堂革命的主要任务、重点、难点和突破口[J].中国高教研究,2019(6):47.
- [5] 阎光才.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相关议题探讨[J].重庆高教研究,2025,13(3):312.
- [6] 朱九思.将两张皮真正变成一张皮[J].高等教育研究,2000(6):2829.
- [7] 潘懋元.教育史是教育理论的源泉[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3,15(1):56.
- [8] 潘懋元.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必须更好地为实践服务[J].高等教育研究,1997(4):47.
- [9] 张华峰,郭菲,史静寰.促进家庭第一代大学生参与高影响力教育活动的研究[J].教育研究,2017,38(6):3243.
- [10] 程猛,康永久.“物或损之而益”:关于底层文化资本的另一种言说[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37(4):8391.
- [11] 谢爱磊.“读书无用”还是“读书无望”:对农村底层居民教育观念的再认识[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7,15

(3):92108,190.

[12] 李琳璐.精英大学“小镇做题家”的生存状态与行动逻辑[J].重庆高教研究,2024,12(4):113127.

[13] 龚放.坚持问题导向,抑或执着理论体系:再议高等教育学研究兼答童顺平“一逆三自”之责[J].社会科学文摘,2017(11):2428.

[14] 柯佑祥.略论高等教育学的繁荣[J].高等教育研究,1999(3):8587.

[15] 阎光才.教育及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数据:兼议当前的大数据热潮[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3,11(4):7786,187.

[16] 钟秉林,洪成文,李立国,等.新时代高等教育研究的取向及路径(笔谈)[J].教育科学,2019,35(6):413.

[17] 胡建华.中国高等教育学科发展40年[J].教育研究,2018,39(9):2435.

[18] 薛天祥.加强学科体系建设 提升高等教育理论品质[J].中国高等教育,2006(9):1416.

[19] 王建华.走向从实践出发的高等教育学[J].江苏高教,2008(2):1619.

[20] 张应强,唐萌.高等教育学到底有什么用[J].中国高教研究,2016(12):5662.

[21] 夏琍.“求真”与“求用”:高等教育研究的理性反思[J].江苏高教,2008(3):810.

[22] 陈浩.推进高等教育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良性互动: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思想体系研究成果述评[J].中国高教研究,2017(8):2629.

[23] 林杰.高等教育学的研究偏向[J].上海高教研究,1998(10):2224.

[24] 刘进,王辉.什么才是真正的“非升即走”[J].重庆高教研究,2020,8(5):4454.

[25] 潘懋元,陈斌.论作为交叉学科的高等教育学[J].高等教育研究,2021,42(4):5660.

[26] 刘志文.潘懋元与中国高等教育学分支学科的发展[J].高等教育研究,2008,29(12):4449.

[27] 杨德广.潘懋元教授与我国第一本《高等教育学》[J].高等教育研究,2008(4):1416.

[28] 潘懋元.关于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反思[J].中国教育科学,2014(4):319.

[29] 张应强.像潘懋元先生那样做高等教育学大学问[J].高等教育研究,2010,31(8):1521.

[30] 胡建华.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昨天、今天与明天[J].高等教育研究,2008(4):2425.

[31] 陈洪捷.北大高等教育研究:学科发展与范式变迁[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8(4):211,187.

[32] 张德祥,别敦荣,周光礼,等.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笔谈)[J].中国高教研究,2019(12):49.

[33] 阎光才.高等教育研究的学科化:知识建构还是话语策略?[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1,9(4):6269,185.

[34] 王建华.高等教育学的演进:学科制度的视角[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1):3642.

[35] 肖兴安,刘建辉.既是“学科”又是“研究领域”:对当代中国高等教育学定位的再思考[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2,30(2):3641.

[36] 胡赤弟.高等教育理论研究的实践价值[J].中国高教研究,2015(1):67.

[37] 田浩然,李立国.高等教育集聚布局及其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基于中美数据的实证研究[J].教育研究,2024,45(7):92107.

[38] 阙明坤,俞健.新型大学组织与城市耦合发展态势研析[J].教育研究,2024,45(4):109122.

[39] 郭丛斌,方晨晨,何菲.博士研究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博士学位授权点区域差异的视角[J].教育研究,2022,43(5):124138.

[40] 张心悦,马莉萍.高等教育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机制[J].教育研究,2022,43(1):3546.

[41] 乔锦忠,孙娜.“双培养”路径对我国科技学术产出的影响:以“C9大学”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为例[J].教育研究,2021,42(12):8494.

[42] 王建华.绩效大学的生成与变革之道[J].教育研究,2023,44(10):8897.

[43] 陈先哲.学术锦标赛制:中国学术增长的动力机制与激励逻辑[J].高等教育研究,2017,38(9):3036.

[44] 李晓光,陆瑶,吴晓刚.高学历劳动者的教育失配[J].教育研究,2023,44(6):122137.

[45] 王世岳,陈洪捷.威廉·洪堡的“全面教育”理念:目标、制度与知识观[J].高等教育研究,2019,40(6):8692.

[46] 刘进,林松月,高媛.后疫情时期高等教育国际化新常态:基于对菲利普·阿特巴赫等21位学者的深度访谈[J].教育研究,2021,42(10):112121.

[47] 文雯,许甜,谢维和.把教育带回来:麦克·扬对社会建构主义的超越与启示[J].教育研究,2016,37(3):155159.

[48] 沈文钦.赫钦斯与芝加哥大学的通识教育改革[J].比较教育研究,2006(4):4445.

(责任编辑:杨慷慨 张海生 校对:张海生)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Theories in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The Absence and Appeals of New-Generation Scholars

LIU Jin^{1,2}, WANG Siyu¹, YU Yitian¹, GAO Yuan²

(1. *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Beijing 100081, China;*

2. *Souther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enzhen 518055,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youngest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disciplines in China, higher education studies has not yet established a basic theoretical system with complete knowledge boundaries and independent disciplinary status. Is the new generation of scholars absent from this endeavor, and what are their intellectual demands? By analyzing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ary patterns of research themes between senior and junior scholars in this field, the study reveals the gradual decline of the older generation's pursuit of "the Dao of the University" among younger academics. Interviewing with emerging scholars and combining with their public discourse o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confirm their subjective tendency to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foundational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is detachment stems from divergent perspectives on traditional research paradigms, dissatisfaction with academic culture, skepticism regarding the discipline's intrinsic value, and subjectively from early-career challenges including capability anxiety and survival pressures. Despite current absence, junior scholars maintain aspirations for disciplinary theory-building. Drawing on their research strengths, they propose integrating specialized problem-solving approaches, expanding theoretical boundaries through interdisciplinary convergence, and advancing empirical scientific transformation of basic theories using novel methodologies and technologies. Scholars from both the older and younger generations share consensus and maintain continuity regarding fundamental issues in the overall direction of the discipline's basic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e differences in research topics and paradigms across generations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natural progression of the discipline's maturation.

Key words: basic theories of higher educatio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new-generation scholars; academic generations